

# 体制位置与社会变迁观

## ——对三个专业技术中产群体的比较分析

郭巍蓉 王正芬

(复旦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国内学者一直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政治态度和行为等议题存有争论。本文认为,这些议题之所以存在异议,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本身内部有分化。造成这种分化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变量:体制位置。本文通过对三个专业技术中产群体的比较分析来探究体制位置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以“社会变迁观”为例)的影响。本文选取医生、投资银行从业者、IT行业从业者这三个专业技术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体制位置以“市场化程度”和“体制身份定义—利益获取形态”作为中间机制,导致了三个群体在对社会改革的主要力量为何(国家或市场)的看法、对社会未来的预期(悲观或乐观)上的差异,也导致了其行为模式的差异。

**【关键词】**体制;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政治态度;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5)06-0068-13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导致了脑力劳动者的增加,一个区别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出现。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起于如何定义和测量中产阶级(见格伦斯基,2005),后来的中产阶级研究则开始转向中产阶级具体的内部表现,如新老中产阶级的区别、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态度、消费模式、生活风格等(米尔斯,1987;贝尔,1984;李普塞特,2011;凡勃伦,2009)。国内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如何测量和划分中国中产阶级(通过如职业、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消费水平、党员身份等指标)、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社会功能与生活风格等(陆学艺,2002;刘欣,2007;卢春龙,2011;孙永芬,2007;陈捷,2013;齐杏发,2010;李友梅,2005;夏建中,2008)。其中,有几个备受争论的议题,包括:中产阶级的异质化程度如何?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特点是什么?中产阶级

是否能推动民主转型?

本文认为,这些议题之所以存在争议,关键在于中产阶级本身内部有分化,而造成这种分化的主要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变量——体制位置。以往国内的中产阶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分层理论的经典视角,缺少对特定的“中国特色”变量的讨论,而“体制位置”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中国变量”。

本文将选取医生群体、IT行业从业者群体和投资银行从业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代表三类处于不同体制位置的中产阶级,考察他们在不同体制位置下的政治态度,以其对社会变迁的看法(简称“社会变迁观”)为例。

表面上,研究所选取的医生、IT行业从业者和投行从业者都是专业技术人员,属于中间阶层。但深层次上,三个群体的形成机制不同,其体制位置不同,可以预见其社会变迁观也因此是不同的。揭

收稿日期:2015-12-02

作者简介:郭巍蓉,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王正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市场社会学。

示这种不同,在宏观结构与微观心态间建立一种解释机制,是本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体制”在许多学者的笔下既指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又指我国“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体制,同时又以“体制”内外来分别指代国家与市场(陆学艺,2002;倪志伟,2002;边燕杰、罗根,2002;陈光金,2005;李路路、李升,2007;卢春龙,2011)。“体制”在中国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体制因素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市场转型的过程之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中产阶级群体。1980—1992年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双轨制时代,最早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底层”人民和得益于双轨制政策的干部子女成为了最早的两个中产阶级群体。1993年以后,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以市场机制为主的转型经济时代。原先享有再分配经济权力的干部子女和专业人员现在开始转而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他们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而那些教育程度最低的最早闯荡市场者已被市场边缘化(周晓红、陈青,2013)。

“体制”在中国之所以特殊,正因为它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之中。在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私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带动市场经济的繁荣;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党依旧保持着其统治地位,强大的国家力量使“体制”处于稳定而鲜有变革的状态(李路路,1998;李友梅,2005;陈光金,2005;周晓红、陈青,2013)。也就是说,1980年以来,尽管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开始逐渐占主导地位,再分配机制的影响仍不容小觑。毋宁说,中国的市场化始终是在国家公共权力支配下进行的,市场始终是嵌入在既有政治权威结构中的(刘欣,2005a,2005b)。相应的,中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受国家权力机制(再分配机制)的影响而形成,另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形成。对应这两条路径,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划分为两个子类型:一类是内源(体制内)中产阶级,另一类是外生(体制外)中产阶级(李路路、李升,2007;卢春龙,2011)。

泽兰尼指出,阶级的形成包含三个维度:主体性、结构性位置、意识(知识的类型)(Szelenyi,1988)。“体制”是否在这三个维度上对中产阶级内部(本文以专业技术知识分子为例)造成了变异,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变异,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在市场转型逐渐深化的背景下,具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否能形成一个将统治建立在知识的垄断基础

之上的“新阶级”?是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新阶级,还是会形成分裂的新阶级?在分裂的情况下,新阶级还能否存在?

### (一)“体制”与结构性位置

在结构性位置方面,“体制”作为重要的分层机制将中产阶级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分割成了两个部分。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社会位置,因此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对形成这种社会位置起着重要作用。公共权力(包括再分配权力以及由此衍生的寻租能力)是当代中国阶层分化的主要动力基础,而对于不享有公共权力的社会位置,再按照市场能力来进行划分。与体制外人士相比,体制内人士拥有更多的再分配权力和寻租机会,他们占据了社会上层的地位(刘欣,2005a,2005b;2007)。由于我国的市场化是渐进式的,这种体制内的优势还易于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边燕杰和罗根,2002)。陆学艺等(2002)也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三种位置作了区分,分别是政治体制核心、政治体制边缘、政治体制外。他们认为,与西方不同,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体制内的成员通常比体制边缘、体制外的成员享有更多的社会政治特权。并且,由于再分配机制自我维持的强延续性以及市场机制带来的强流动性,体制内中产阶级的代际延续性也强于体制外中产阶级(李路路、李升,2007)。由此可知,体制内中产阶级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机会通过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竞争在多年之后上升到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如基层公务员、医生等),从而拥有一定的再分配权力和寻租机会,其体制内优势也易于转化为体制外优势(如更强的社会、文化资本),使他们更有可能再生产其上层中产阶级地位。而体制外中产阶级大多属于“下层中产阶级”,即使他们拥有再强的市场能力,由于无法接触到公共权力,也只能占据社会结构的中层位置,市场的强竞争性与流动性也使得他们难以再生产其中产阶级地位。

然而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力资本(劳动力、教育和技能)而非物质资本、政治资本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愈发重要。赖特指出,在奴隶社会或封建主义社会中奴隶或农奴并不(完全)拥有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与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自己那一个单元的劳动力(个人资产)。而后资本主义社会则以技能(非外化的资产)的所有权为主要分层标准(Wright,1980,1984,2005)。不仅如此,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阶级理论指出,在20世纪,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崛起,他们与资本

家和官僚展开权力争夺,后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被新阶级统治(古尔德纳 2001)。随着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科学家和科学理论知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创造出容纳新知识阶级的空间(贝尔,1984;Szelenyi,1988)。从中国范围来看,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经营剩余以国家租金的形式存在,人力资本产权缺失(刘欣 2005b)。但是,市场转型将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公共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直接生产者的权力相对再分配者而言有所增加,因此可以期待今后会出现政治权力贬值、人力资本升值的情况(倪志伟 2002)。而人力资本是市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能力进一步影响了生活机遇(见周雪光 2014)。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回报可以被看作一个侦测一个国家(或行业)在多大程度上以再分配机制或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中间变量。

## (二)“体制”与意识

在意识方面,“体制”影响了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政治意识和行为。对体制的这种影响,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体制内中产阶级更保守,体制外中产阶级更激进;另一种认为前者更有“主人翁”意识,更乐于参与公共生活;后者对政治更为冷漠。李路路和李升(2007)指出,内源中产阶级和外生中产阶级相比,前者较为保守,后者较为激进。陈捷(2013)认为,依附于党和国家的中产阶级更赞成保护个人权利,但对于如游行示威和结社的政治自由采取回避的态度,对政治制度、政治参与也不热心。

与前者不同,卢春龙根据2008年进行的“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调查”的数据发现,在对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对政府奉行的基本原则、对政府执行的具体政策、对政府具体机构的信任这四个方面,体制内中产阶级比体制外中产阶级表现出了更强烈、更高层次的正面评价和认同感;关于中国特色民主的评价,体制内中产阶级表现出最为积极的首肯,他们认同家长式的政府领导人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强调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相比之下,体制外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是政治冷漠和政治后卫的特点(卢春龙 2011)。李友梅(2005)则发现,上海白领群体有“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的行为。

## (三)“体制”与主体性

在主体性方面,那么到底是哪些人占据了社会中产的位置?他们如何定义自身?他们是否准备好去追求阶级利益?根据陆学艺等人的研究(2002),当代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十大阶层(1)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卢春龙(2011)将上述(2)、(4)、(5)、(6)都归为中产阶级。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属于第四阶层。根据刘欣(2007)“五阶层”的阶层分析框架,处级党政事业单位领导、科级国有企业负责人、中级及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等属于中产上层,在社会中占比7.6%。科级党政事业单位领导、科以下国有企业负责人、初级职称及无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等属于中产下层,在社会中占到22.8%。而对应中产阶级形成的两条路径,中产阶级大致可以被区分为两个子类型:体制内中产阶级和体制外中产阶级(李路路、李升 2007;卢春龙 2011)。然而以上都是按照某种标准被人为划进中产的“主体”,我们既看不到他们如何定义自身,又看不到他们追求什么样的利益,因此也就看不到其“主体性”。

以上研究都较为偏重体制带来的结构性因素对社会分层以及生活机遇的影响,从中可以提取出“市场化程度”及“人力资本回报率”作为体制位置的宏观效应。但是较少有研究提及体制位置的微观效应,即主体性部分(包括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如不同群体如何定义自己与体制的关系、他们能从体制中获得什么类型的利益、所获利益是否和身份定义相符等等。鉴于此,本研究将在市场化程度这一宏观中间变量之外,加入“体制身份定义—利益获取形态”作为微观中间变量。

本文将采用的框架即上述“结构性位置—主体性—意识”的三维框架。文章将以中产阶级中的专业技术群体为例,探讨体制位置是如何通过结构性位置和主体性两方面对其意识(社会变迁观及行动策略)产生影响的。为了突出“体制”造成的变异,文章选取了(公立医院)医生、IT行业从业者和投资银行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三者同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他们是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占有生产资料但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体制内或体制外非体力劳动者。医生群体属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中产阶级,是事业单位中的专业技术人员;IT行业从业者属于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中产阶级,是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投行从业者虽然是体制外的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受到体制的影响并积极与体制合作,属于依附于体制生存的中产阶级。<sup>①</sup>也即,医生、投行从业者和IT行业从业者处于相近的结构性位置,但属于不同部门,这证明了三个职业群体的可比性。

此外,不同于以往学者的“体制内—外”中产阶级二分法,本研究将在体制内外两个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加入第三个中产阶级类型: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这一中产阶级虽然处于体制之外,但国家力量却从没有退出其所在的行业,相反,行业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都强烈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我们将会看到,中产阶级按照不同的体制位置被三分之后,其群体特点和社会政治态度也将清晰起来。本文的研究框架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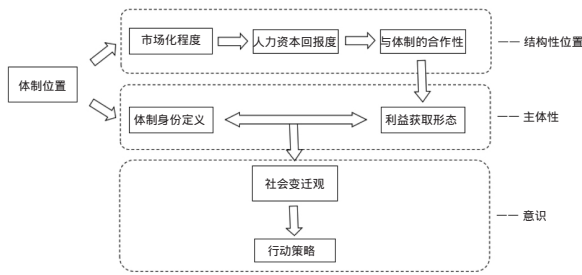


图1 文章的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按照体制位置的不同,本文选取医生群体、IT行业从业者群体和投资银行从业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由这三者来分别代表体制内、体制外和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研究方法主要为访谈法,辅之以微博观察法。研究访谈了28名工作于上海和南京的公立医院医生、18名工作于上海的投资银行从业者和31名工作于上海和北京的IT行业从业者(受访者的具体信息见表1)。对医生的访谈主要以公立三甲医院的受访者为主。对IT行业从业者的访谈主要以中层技术管理人员(如产品经理)和基层技术人员(如程序员)为主。本文的IT行业从业者是有所限定的,主要指IT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从事编程、研发或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投行从业者的访谈中,受访者既有资深投行人,又有初入行的年轻投行人,还有个别人女性从业者。所有访谈于2013年4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上海、南京、北京进行,每次访谈时间约为2小时。此外,关于微博样本,研究在新浪微博上对每个群体分别随机抽取了50个关键词为“医生”、“IT”(或IT从业者、程序员等)、“投行”(或投资银行、投行从业者等)的微博认证用户,阅读了其近两年的微博文本,对其社会政治态度进行了编码。<sup>②</sup>

接下来的实证分析分为三个部分来呈现。第一部分具体阐述三个群体的社会变迁观;第二和第三部分从结构性位置与主体性的维度论述体制位置如何影响特定社会认知的中间机制。

三、社会变迁观:专业技术群体如何看待改革  
对于何为社会改革的主要力量,三个群体有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医生	投资银行从业者	IT行业从业者
性别			
男	21	13	22
女	7	5	9
年龄			
20~29岁	2	7	7
30~39岁	5	9	17
40~49岁	8	2	6
50岁及以上	13	0	1
职位级别*			
初级	2	8	9
中级	7	7	6
高级	19	3	16
工作年数			
5年及以下	2	10	6
6~15年	2	8	22
16~25年	3	0	3
26年及以上	21	0	0
总计	28	18	31

\*医生职位级别:初级:住院医师;中级:主治医师;高级(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IT行业从业者职位级别:初级:普通工程师;中级:高级工程师;高级:产品经理、部门经理等技术及管理职位。

投资银行从业者职位级别:初级:经理(Associate/Senior Associate);中级:总裁(Vice President/Senior Vice President);高级:总监(Director/Executive Director)。

不同的看法。医生认为,国家应承担起调控者的角色,自上而下地作出制度改革;IT行业从业者认为,市场本身就可以自下而上地推动制度改革;投行从业者虽然承认国家的作用,但认为国家应该缩小其职责范围,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一)医生:国家精英论

根据访谈和微博观察,医生在谈及社会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将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或政策的问题,而不是归结为个人的因素。他们认为被指责的个人其实是制度和政策的“替罪羊”。

“中国的医患矛盾其实是患者与医疗体制的矛盾以及医护人员与医疗体制的矛盾,但是一直被引导转嫁成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医事服务费’这一举措亦是如此——矛盾还是被掩盖的,政府始终还是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医疗体制中应承担的义务。”(微博,YRZHX-20120519)<sup>③</sup>

他们在分析社会问题更注重结构性因素(如

体制、制度、政策、程序等)而更少注重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且不可控的属人因素(如道德、素质、心理等)。

“如果我们只是出于义愤而把很多问题全部归结为道德、信仰、国民素质,那么,这个社会就真的让人绝望了,因为这些问题人类几千年都解决不了。如果我们出于责任和理性把很多问题归于管理、程序、法律的问题,那么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至少是可控的。”(微博,SYPIYZ-20120529)

医生群体的这种对于社会问题的中立化与非个人化归因倾向,使得他们提出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带有制度化倾向。既然医生中立地将很多医疗和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非个人”的制度,那么在他们看来,改变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同时,医生也认为,要改变制度,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从底层改起也几乎不会有效果。因此他们寄希望于“顶层设计”,希望国家作为调控者,通过自上而下的改变来解决医疗和社会问题。有受访者就指出:“其实[改革]应该是‘顶层设计’,顶层要宏观地去看怎么改,从根本上大环境上去改变。现在小打小闹的在下面改改根本没用。”(访谈,YS-20130506)<sup>④</sup>(郭巍蓉,2014:69-74)

这种社会变迁观可以被称为“国家精英论”,认为医疗和社会改革的主要力量还是在于国家和上层精英。既然医生认为自己现在的窘境是由国家的忽视而造成的,那么国家在今后的改革中应该更多地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有些问题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需要国家管理的社会问题。

“医院对于意外事故(如H7N9朱亮亮的死亡)道义上的赔款是需要的,但是医学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无法防止意外的发生。会有矛盾,应该是国家的问题。这种突发疫情,或者是结核病,如艾滋病,都应该是国家来统一管理的,因为这些病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会变成社会问题。如艾滋针事件。”(访谈,YS-20130427)

## (二)IT行业从业者:社会进化论

身为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IT行业从业者普遍信奉一种“进化论”式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观指导着他们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看法。所谓进化论,是指一种认为事物会自然进化、优胜劣汰的信念。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图式事实上是“无政府”状态的: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能得到充分发挥,国家退出市场,或者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在政治领域,希望通过市场竞争自下而上地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而民主又可以反过来进一步支持公平的市场竞争。其政治改革观与经济观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几乎所有IT行业从业者都推崇自由的市场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与垄断。他们认为市场竞争有利于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对北京IT行业从业者的问卷调查<sup>⑤</sup>显示,46.6%的受访者表示,IT行业只需要些许国家干预(尤其是在完善法律法规上),32.8%的受访者表示行业完全不需要国家干预,市场自然会调节。<sup>⑥</sup>

“我其实觉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诸如食品安全等问题)自然而然就好了吧。现在物质(条件),虽说中国还不错,但是相对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来说还比较贫乏,那么可能就有人为了谋求利益,所以那样做(违反食品安全的事)。当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所改变。”(访谈,IT-201305XXa)

“其实在中国,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大部分的财政还是靠土地。所以说看上去在打压房价,其实只是抑制房价,他们想的只是稳定增长。但其实这是个很危险的举动,像别的国家,比如日本,最后都失败了。这些都应该交给市场来决定,太多宏观的调控其实很破坏市场的健康。”(访谈,IT-201305XXb)

“希望借改革开放来倒逼政府体制的改革。让整个体制内的那么多人主动地去改变,没有人愿意,因为对他们没好处,但是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国外企业进来,这需要对政策作出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可能是对这些体制内的人是有好处的。一旦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愿意去改变,一旦他们改变,整个国内的政治局面就会好转,就会更开放,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访谈,IT-20131231)

从以上访谈可以看出,在IT行业从业者眼里,市场就像一个大的过滤器,不论是把竞争者放进去,还是把社会问题放进去之后,经过市场筛选,自然会给出一个满意的局面。而违背市场机制的人为调控被视作是对市场健康的破坏。市场作为过滤器的性质同样被认为能推动政治改革。市场竞争不仅能鼓励个人主义式的成功,更能自下而上地逼政府作出改变。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观并不是颠覆式的,而是通过市场这个媒介来渐进式地进行改革,通过引入竞争使得配套法律可以逐步完善,而一旦改革开了头之后,改革趋势就会逐渐蔓延到整个国家制度上,从而推进民主化进程。

## (三)投行从业者:“小政府—大社会”论

对于接受过精英教育的投行从业者来说,他们对何为理想社会和理想经济事实上有着最为完整的见解:

“政治状态呢,就是国家、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政府应该是防守型、服务型的,应该是很小的。

……经济呢,是一个完全靠全民自发的经济,靠民间治理和推动的,而不是政府引导的经济。不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投资,要靠民间资本的力量,让它自由发展,这是比较好的状态……社会状态是大家比较多元化,要少干预,文化繁荣,思想自由,百花齐放。总之社会应该是自由的。”(访谈,TZYH-20130802)

“这种光靠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的经济,不知道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它和这种真正的民营经济、社会真正的经济实体的发展能不能吻合起来。……经济是有自己一定的循环规律的,你打破经济规律,强硬地用行政手段来调控,那我觉得迟早也调控不了吧。”(访谈,TZYH-20130929)

以上访谈展示了在投行从业者看来,政府越少介入社会,经济运行越好,而民营经济、市民社会要变得自主起来,形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图式。一名从业者这么写道:“当处处能感受到政府的存在时,政府就处于不健康状态。如同好的内脏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微博,SJZ-20140403)在他们的理想图式中,没有国家或者市场一家独大,而关键是在于民间,在于人本身。正如一名受访者说的:“要让老百姓真正地有自己的话语权,每个人,有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声音。可以让每个人都发出不同的声音”(访谈,TZYH-20130929)。投行从业者可能是这三个群体中最强调民主和自由的,他们反对监管,提倡社会和政治上的自由以及思想上的多元,希望政府从“全能”政府退而成为“服务型”政府,让位给市民社会来施展拳脚。他们希望个人、希望民间能更有作为,而不是被制度和政策所束缚。这也是他们心中的社会改革的改革方向。

#### 四、市场化程度及与体制的合作性

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是体制位置不同所带来的宏观结构效应。所谓市场化程度,指的是一个行业在多大程度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自由竞争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制度与政策的规制。一般来说,体制内的行业市场化程度较低,体制外的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依附于体制的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则介于两者之间。而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带来的人力资本回报度的不同,使得三个群体对体制产生了不同的合作性。

(一)低度市场化、低人力资本回报及与体制“不合作”

公立医院医生一般处于“半开放”的医疗环境中。所谓“半开放”指的是:一方面,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被严格要求回归公益性,促进医疗公平;另

一方面,中高端医疗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空间,这对拥有较高专业技术的医生是有利的(郭巍蓉,2014:59)。不过对那些并非高精尖专家的医生来说,这样的市场化也与其无关。“体制”总体而言还是大大限制了医生从市场中合法获取利益的能力。

医疗体制改革本身就显示了国家干预医疗行业的决心。医改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国家干预的历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以大量的财政投入建立了覆盖几乎所有城乡居民的“全民医保”医疗网络。然而这一体系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瓦解。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自此开启了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医改以来,政府对医疗领域的投入大幅减少,造成了一种自负盈亏的局面。在医疗服务费维持几十年前的低水平、政府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5%左右的情况下,医院普遍负债严重,医院只能通过药品提成、过度检查与过度医疗来维持经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名存实亡。新医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就是其中的一项重点。新医改要求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逐步取消“以药养医”。但到20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仍然只占GDP的4.98%(卫生部,2012),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5%的标准。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以药养医”、医生“拿回扣”、“拿红包”的现象因此无法根除(郭巍蓉,2014:91-92)。

国家对医疗领域不依赖于市场的直接干预,使得医生境遇的好坏受到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强烈影响。由体制分割而带来的行业市场竞争的缺乏,使得医生的专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在其收入和待遇上有直接的体现,即多年投资的人力资本得不到相应回报。尤其是当他们将自己与国外的同行、与国内的其他行业相比时,他们会产生非常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医生因而对医疗领域的未来、对个人的努力持消极的态度。

“比照国外,医生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国民收入水平相差2~4倍是合理的。比如上海市人年均收入如果是8~10万,医生应该是40万。同样的工作在美国比如拿5万美元的年薪,中国的医生一般只有20万甚至10多万。在不谈灰色收入的情况下,医生的基本工资甚至比城市的人均收入还要低。”(访谈,YS-20130506)

“我们晋升中级职称、高级职称要博士、研究生。哪个行业像我们医生这样作晋升硬条件的?没有的。……你看像政府机关公务员他不要求这个

的。(同是晋升)为什么我们医护人员不可以倡导这个呢?医护人员压力太大了,所以我的子女不会再学医。我的子女能进公务员为什么不进?为什么学医?现在当官最好,现在当医生的很多人都觉得当公务员最好。”(YS-20130426a)(郭巍蓉,2014:71-72)

除了收入与专业技术水平严重不符外,医生较低的人力资本回报还体现在医生职业声望的下降,甚至是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上。据卫生部统计,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发生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sup>⑦</sup>与此同时,针对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与以往相比也成倍增长,如哈医大杀医、北京同仁医院砍人、温岭杀医事件等。媒体对于医患矛盾的恶化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媒体所报导的“8毛钱治10万元病”、“缝肛门”、“扇耳光”事件等,无不将医生置于社会负面舆论之中。而就笔者搜集到的访谈和微博数据而言,医生普遍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体制”的原因。

“关键是目前体制让医生这个行业渐渐丧失了职业尊严和荣誉感,政府投入少,医院要生存,要考核医生的经济指标,医生要生活,独善其身已经很难。所以目前在国内做一个纯粹的医生已是一种奢望。”(微博,BWDSYN-20110806)(郭巍蓉,2014:67)

他们希望,对制度的顶层设计能改变现状,却又意识到要彻底改革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认为,首先国家确实无法对医疗行业投入这么多,其次利益集团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阻挠改革,<sup>⑧</sup>再次医生缺少在改革中的代表和发言权,最后国家似乎就是以现在这个政策来转移矛盾的。在这种矛盾思维的摇摆中,他们难以再与体制保持合作性。

(二)中等市场化、中等人力资本回报及与体制“积极合作”

虽然投行行业的国家干预程度不及医疗行业,但国家监管部门在这一行业中也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体制由此形成。证监会的职责是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sup>⑨</sup>证监会的机构设置包括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如稽查总队)、内部职能部门(如发行监管部)以及分设在全国各行政区域的派出机构(如上海证监局)。科层式的组织架构和精密的职能分类使得国家监管之网得以覆盖金融行业的角角落落。除各级机构的监管之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全面规范着金融行业:从199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到2006年同时修订与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资本市场被严格地规范着。证监会还在不断加强其稽查执法的职能,查办了“琼民源”、“银广夏”、“中科创业”等一系列违法违规事件,以维护市场秩序。

面对如此严密的监控,投行从业者普遍感觉在为符合证监会的要求而疲于奔命,难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价值和判断。除了缺乏信任的监管以外,不同于从业者所向往的美国式的注册制,中国目前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是核准制,即证监会揽下了证券能否最终发行的大权,因而从业者只能对掌握了“生杀大权”的证监会言听计从,既不能表现出违抗,又要积极博得审核员的好感。他们做不到像IT行业从业者那样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人力资本来进行工作。

“作为监管部门,中国证监会本应为裁判员,但20年来,它首先自我定位为婆婆,对资本市场横加干涉,作为裁判员,又不能做到‘三公’;同时经常下场当运动员,深深地陷入利益泥潭。”(微博,WYQ-20120211)。

“中国投行和证监会的关系是勾搭,美国投行和SEC是沟通。”(微博,NRERO-20130519)

然而另一方面,投行从业者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又要高于医生群体,因为从整个行业来说,资源基本上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配置,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低效和其他一系列问题;从个人来说,从业者的劳动力定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场化的,其所获得的奖金是根据个人对项目所做贡献进行分配的,即收入与个人贡献与能力成正比。此外,现行的金融体制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制度红利,包括丰厚的薪水、较高的社会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源等。

首先,最为突出是保荐代表人制度。2004年,证监会出台保荐代表人制度,规定每个申报项目都必须有保荐代表人的保荐,并限定每个保荐代表人一年只能保荐一个项目。一时间,保荐代表人成了各大券商争相抢夺的资源,拥有多少保荐代表人成为衡量证券公司实力的标准之一。由此,保荐代表人的薪水水涨船高,在金融市场最繁荣的2008年左右,即便什么事情都不做也可以轻轻松松年入百万。其次,由于体制分割带来的垄断因素和职业的专业特点,投行从业者常常被认为是“金领”,享有社会精英群体的声誉。再次,投行从业者在工作常常要和各种行业、各种人打交道,其中大多是大、中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各地方政府、

证监会的官员,这给他们积累了宽广的人脉资源。

“投行对人的锻炼还是很不错的,你可以和很多各行各业的、做企业的、比较成功的人士接触,对未来的话,如果自己创业的话,就算你想做别的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访谈, JZYH-20130804)。

由中度市场化带来的中等水平的人力资本回报,使得投行从业者虽然不甘心但还是积极与体制合作。封闭的体制能带给他们许多好处,与此同时,除了妨碍他们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以外也不带给他们严重的损害。

(三)高度市场化、高人力资本回报及与体制“无涉”

IT行业是这三个群体所在的行业中市场化程度最深的,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以及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都是IT行业高度市场化的表现。IT行业有着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是许多从业者公认的事实。以软件业为例,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的数据,2008年软件业其他服务业企业资产合计41,655,000万元,是2004年企业资产总额的2.18倍;软件业其他服务业企业经营利润总额达到3,612,000万元,相较2004年翻了三番。从整个行业范围来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企业家即期信心指数在2012年的4个季度都保持在140以上的水平,分别为156.4、147.9、141.5和148.9,表现出企业家对本行业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较高的积极与乐观态度。IT行业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使得许多人都涌入到这一行业中来。相对较低的入门门槛、较好的行业发展前景导致了从业者的大量增加,使得IT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尤为激烈。从2007—2010年,软件业其他单位从业人员数分别达到了26.1万、31.7万、34.8万和43.5万,而与此同时,软件业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数仅为7586、9000、9000和10000人。可以说,这是一个缺乏国家力量参与的高度市场化的行业。

在市场化行业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私有产权,是受国家保护且不受国家政治权力侵犯的,人力资本拥有者有权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竞价和交易(刘欣,2005b)。也即,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意味着高度的竞争性,也意味着高度的人力资本回报。以中国应届生在互联网、IT市场上的起薪为例,主流的互联网公司能给985、211高校本科毕业生(年薪)20万左右的起薪,硕士生能拿到的更多。而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年薪会随之大幅上涨。例如工作3年即能达到25万以上。<sup>①</sup>IT行业从业者的教育、技能投资在市场中能得到较高的回报,这使得他们同意一种“努力了就会有回报”的个人主义

式成功观。

“如果我们说在小范围内,在一个城市范围内竞争的话,应该算是公平的。你只要足够努力的话,你还是有机会的。之前看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我们大部分人的努力其实还没有到拼天赋的程度’,就是说你努力得不够,或者不够勤奋。”(访谈, JT-20131231)

他们认为“体制”不仅会破坏市场秩序,而且会阻碍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成功,而助长那些裙带主义的非个人式成功。那些在国企和非国企都工作过的人尤其能体会这一点。

“如果在体制内要想有所发展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会和那些拼爹的人竞争。……在国企和在外企的付出是完全不对等的。在国企可能付出十分功,只获得两分,在外企付出十分所得到的可能就是八分。”(访谈, JT-201305XX)

因此,由于所在行业的高度市场化与高人力资本回报,作为市场化中产的IT行业从业者与体制之间是“无涉”的关系,即行业内缺乏体制性因素(国家干预与国企垄断),他们也不希望行业受到国家力量的干预。

#### 五、体制身份定义、利益获取形态与社会变迁观

除了市场化程度这一宏观结构效应外,“体制身份定义”是体制位置所带来的微观效应,它与“利益获取形态”一起构成了这三个中产群体的主体性部分(身份认同与利益诉求)。“体制身份定义”指的是群体根据体制与自身关系的判断而作出的身份定位。“利益获取形态”则指的是三个群体分别是如何通过体制获得利益的,他们得到了哪些利益,又有哪些利益受损。

#### (一)体制身份定义:“专业精英”与“技术平民”

根据访谈与观察,大多医生将自己定义为体制内的专业精英,投行从业者将自己定义为依附体制的专业精英,而IT行业从业者则将自己定义为体制外的“技术平民”。体制位置主要通过以下两点带给不同群体以不同的身份定义:

首先,体制给医疗行业和投行行业带来了封闭和垄断因素,也因此使得这两个行业的入门门槛要高于IT行业。医生需要经过长达十几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才能进入医疗行业,并且医术的进步也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投行从业者要从事投行业务需要具备特定的资质,其平均学历水平也很高,多为硕士及以上(就访谈和微博样本而言)。相比之下,IT行业从业者技能形成的周期没有这么长,其技术属于“学成即可用”、“一招吃天下”的类型,其受教育水平也高低不一。以上说的是个人的行业准入门槛。而对于企业来说,在新兴IT行



业,尤其是互联网、APP领域,行业准入门槛同样偏低,有时甚至一个人带着好的创意、一个小团队和一笔不大的资金就可以开办一个小公司,涉足这一行业。然而,这在医疗行业是行不通的。先不论医疗行业长期被国家所垄断,即使是在医疗市场化的领域,开办民营医院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专业的设备和专家型人才等资源。投资银行也是如此,资金、客户、专家等对一般人来说都是过不去的坎。

其次,体制使得行业标准不同。处于体制内意味着更强的国家干预,同时也意味着行业的标准受国家严格规范,行业标准更高。前文提到过,医疗行业和金融行业作为国家控制的重要行业,具有严格的行业标准和规范,遵行一套标准化的框架。而在IT行业,由于缺少统一的、规范化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产品质量往往参差不齐,业内的抄袭、盗版现象也屡见不鲜,很容易形成恶性竞争。

IT行业从业者深知自己行业的这些特点,当他们将自己行业和其他与体制有关的行业(如医疗、金融、“政界”等)对比时,他们就会深切地感知到体制内外的差距,自动地将自己定义为“技工”、“平民”,而不是“专家”、“精英”。另外,IT行业从业者如此定义自己还由于知识技术体系本身的原因。医学、金融学可以被称为“科学”,具有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作为支持,而且这套体系是“精英化”的,对普通人的可及性较小。计算机科学是一套相较之下可及性更大的“平民化”的知识技术体系,且其体系更多地是“颠覆型”的(很多知识技术会更新、淘汰),而不是像医学、金融学那样更多地是“积累型”的。

封闭、垄断、静态是“精英化”的标志,体制就提供了这些标志,使得医生和投行从业者可以将自己定义为体制内的专业精英。而IT行业从业者只能将自己定义为体制外的“技术平民”,或者用流行语来说,定义为“屌丝”。

## (二)利益获取形态 利益的四种类型

与体制身份定义相应的,三个群体也会对这种身份应得到何种利益有所期待。而实际得到的利益是否与预期相符,最终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变迁观和行动策略。这里的所说的利益具体包括人身安全、经济利益、声望等。按照“与体制关系”和“与体制的合作性”<sup>⑩</sup>两个维度,本文将利益划分为四种类型(见图2)。与体制的关系就是“体制位置”,这里将“体制内”和“依附于体制”都归为与体制的强关系,“体制外”归为与体制的弱关系。而“与体制的合作性”,指的是群体是否与体制合作,是否积极配合国家的具体政策与措施。

### 1. 委身型利益



图2 利益的四种类型

群体与体制是强关系,但与体制的合作性弱,由此带来的与体制有关的利益是委身型利益。医生群体的利益即为这种利益的典型代表。由于体制的关系,医生获取正当经济利益方面受损,或者说是获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受损。如今医患矛盾频发,他们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利益也受到损害,并连带着声望上的受损。但即便如此,体制还是为其总体利益提供了保障,不仅为其提供了“铁饭碗”和编制福利,更让他们有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因此即使他们表面上对体制有诸多抱怨,不愿与体制合作,他们也因着体制能带给他们的益处而在体制内“委曲求全”。

医生从体制方面获得的委身型利益使得他们对体制的态度很复杂,对体制改革的想法也倾向于保守,即更倾向于支持国家作为调控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国家对公立医院保持公益性的要求与医院“自负盈亏”的实际状况之间有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医生的利益因此受损,他们也依旧能通过有利的制度位置所带来的权力、收入补偿,通过流动到中高端医疗市场,来补偿自己受损的利益,实现收入转移,使他们仍然拥有相对的强势群体的定位。因而他们提出的不少要求都是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

然而对医生来说,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利益与他们的预期很不相符,不符合他们对自己的体制内专业精英的定义。他们期待社会有对专业技术精英的高度尊重,他们期待自己的收入能与自己的专业价值成正比,他们期待医生能有“专业自治”,然而现实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这使得他们产生了“怨天尤人”的情绪,也使得他们对社会未来的预期变得悲观。因此,医生的行动策略是退缩型的,他们有很多抱怨和牢骚,也有理性的建议,但他们在行动上很弱,多采取“惹不起则躲”或者“决不让下一代学医”的消极策略。

### 2. 寄生型利益

群体与体制是强关系,与体制的合作性也很强,由此带来的与体制有关的利益是寄生型利益。<sup>⑪</sup>投行从业者的利益即为这种类型的利益。他们借助着与体制的合作,在经济利益和声望上获益,获

得了“寄生”于体制的成功。这一利益与委身型利益的区别在于,他们乐于与体制合作,因为体制带给他们的好处要多于坏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监管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成功,但若没有体制带来的封闭、垄断与红利(如高收入、高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源等),他们也不一定能走到现在这一步。他们是现实的理性主义者,其处事原则是实用主义的。当他们估计抗拒体制或消极配合体制会带来效益的损失时,他们就会避免去这么做,相反,如果积极与体制合作会给他们带来收益最大化,那么他们即使心里不甘心,也会在最大程度上做到配合体制。

对投行从业者来说,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丰厚经济利益是与预期相符的,符合他们这一专业精英的体制身份。然而他们缺少体制核心人物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这使得他们对未来显得惴惴不安,因为他们明白一旦发生动乱,自己这个有产的中间群体将会受到最大冲击。<sup>⑭</sup>因此,投行从业者对社会未来的预期徘徊于乐观与悲观之间。相应的,他们的行动策略是“用脚投票”型的,即充分利用体制带来的好处,一旦社会前景不佳就出走。<sup>⑮</sup>

### 3. 独立型利益

群体与体制是弱关系,与体制的合作性也很弱,由此带来的利益是独立型利益,这种利益事实上“与体制无关”。IT行业从业者(体制外市场化中产阶级)的利益即为这种利益的典型代表。对他们来说,一般的经济利益能靠个人努力在体制外自给自足地得到满足,但很难达到寄生型利益所能达到的那种高度的经济成功,而且普遍缺乏声望。独立型利益是四种利益类型中特殊的一种,因为由于行业内市场机制的高度贯彻,它是惟一与体制毫无关系的利益。由于从业者将自己定义为体制外的技术平民,那么就无所谓体制带给他们的利益与他们预期是否相符这一说。他们所拥有的利益至今为止都是在体制外、在市场中奋斗的结果,他们不会奢望体制能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甚至希望体制、公权力不要伤害他们即可。

身为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他们的努力在市场中能得到回报,市场的竞争也让他们预期着社会的进步,所以,他们奋斗着、憧憬着,相信更好的未来在前方等着他们。相应的,他们的行动策略是奋斗型的,注重个人的努力与奋斗,并且他们相信、期待体制会有变革。<sup>⑯</sup>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处于不同体制位置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变迁观不同。体制位置主要通过两

条机制影响了社会变迁观:作为宏观效应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作为微观效应的体制身份定义—利益获取形态。

#### 1. 三类中产阶级,三类社会变迁观

医生属于体制内中产阶级,他们所在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国家干预程度很强,并且他们实际获得的利益与他们期待与自己体制身份定义(体制内专业精英)相应的利益不符,从而造成了医生所获得的利益是委身型利益,即虽然职业声望和人身安全利益受损,但他们依然离不开带给他们稳定身份的体制。在个人努力和专业技术受到国家定价而无法市场化、利益受损却还要违心挂靠体制的情况下,医生对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并不看好,他们成为了悲观的犬儒主义者。而且由于长时间处于体制之内,他们的社会变迁观也是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他们希望通过改良体制和制度来正当地获取利益。但他们同时也对国家这一改革力量存疑,因此他们对是否能真正改革也不抱有太大的希望。

投行从业者属于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他们所在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一般、国家干预程度较强,并且他们实际获得的经济利益与他们期待与自己体制身份定义(与体制合作的专业精英)相应的利益相符,但依旧缺少再分配权力。他们所获得的利益是寄生型利益,即借助与体制的积极合作而得到可观的经济利益与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体制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他们尽量避免与体制发生冲突,避免参与到那些可能对现有体制造成破坏的社会事件中去,因为他们的务实的理性主义告诉他们这样做的风险和损失远大于收益。而且社会动荡和底层革命对于他们这种处于尴尬位置的有产一族来说是最致命的,也是最要竭力避免的。因此,他们即使对束缚他们创造力和活力的现有体制心存不满和不甘,他们也会在表面上积极配合体制,实现财务自由后他们才“有路可退”。他们对社会未来的预期徘徊在乐观与悲观之间,积累足够的财富后移民就是他们不看好社会未来发展时的首要对策。他们在社会事件中习惯性失声,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关心社会问题。事实上,由于他们的高学历、高收入和行业精英地位,他们其实对社会改革有自己清晰而理性的认识:他们最渴望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图式,渴望政治自由和民主,也希望每个人在社会中能更有作为,而不是被僵化的体制所束缚。他们看得很清楚,但却不愿意付诸行动。

IT行业从业者属于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由于身处高度市场化的行业中,且体制对他们

的利益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他们因此倾向于认为社会的改革力量主要是市场，通过市场来自下而上地倒逼政府进行改革。他们对社会未来的前景也较为乐观，因为他们的个人努力和专业技术的定价是市场化的，个人努力能得到即时回报。虽然会有随时被淘汰的危机感，但他们还是憧憬着未来，不断地奋斗着。对比医生和投行从业者“身不由己”的与体制的纠缠，IT行业从业者似乎就是一群脱离体制、脱离政府的局外人。他们很少卷入社会事件，也不怎么关心社会问题，他们对体制也没什么深刻的看法，并且一直将体制视为不属于他们这个市场化世界的“黑暗的他者”。

至此，本文已经阐明了体制位置与社会变迁观的关系，并阐释了其中间机制。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中产群体并非没有“共识”，因为研究还发现，三个群体都拥有市场主义的经济观。IT行业从业者的市场主义是与前述其进化论式的市场决定论一脉相承的，他们相信市场的优胜劣汰法则，认为市场主义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投行从业者身处资本市场，尽管受到监管部门的限制，他们也崇尚经济上的市场主义，并认为资本至上，应该多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医生同样指出，惟有市场化方能解决新医改以来医疗公益性与盈利性之间的矛盾。他们的这种市场主义比较温和，不如IT行业从业者来得那样激进和彻底。他们觉得经济发展应以市场机制为主，辅之以国家的适当调控，保持公益性和盈利性的平衡。

表2简单总结了对三个群体的比较分析。

2.对三个中产阶级研究争议的回答

以上的研究可以回答一些争论已久的话题。

其一，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较为同质的群体？本文的观点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同质化程度较低，他们被体制位置分化为完全不同的三种类型：体制内中产阶级、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和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这三种中产阶级有着不同的社会变迁观，也有大相径庭的行动策略。可以说，“体制位置”是研究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一个重要变量。

本文由此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特点是什么？事实上，政治冷漠只是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的特点，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无意识。而政治保守是体制内中产阶级和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的特点。政治保守不同于政治冷漠，政治保守的中产阶级对社会政治问题有自己的态度和关切，只是其立场是保守主义的；而政治冷漠的中产阶级却不关心这些问题。李友梅(2005)指出，中国白领群体常会有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的行为。而本文认为，三类中产阶级虽然确实都表现出弱政治参与，但其政治取向却有很大的差异：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是弱政治取向，体制内中产阶级是强政治取向，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则居于两者之间。

本文可以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中产阶

表2 三个群体的比较总结

比较项目群体		医生	IT行业从业者	投行从业者
体制位置(结构性位置)		体制内中产阶级	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	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
中间机制1 (结构性位置)	行业的市场化程度	低	高	一般
	人力资本回报率	低	高	一般
	与体制的合作性	较弱	无	较高
中间机制2 (主体性)	体制身份定义	不流动的、非市场化的体制内专业精英	流动的、市场化的、体制外的技术平民	半市场化的、依附于体制的专业精英
	利益获取形态	委身型利益	独立型利益	寄生型利益
社会变迁观 (意识)	主要改革力量	国家，上层精英	市场	市场为主，国家适当辅助
	社会未来预期	悲观，“看穿世事”的犬儒主义者	较乐观，憧憬着未来的奋斗者	乐观与悲观之间，小心翼翼的观望者
行动策略 (意识)		抱怨、牢骚，“惹不起则躲”策略	奋斗，相信体制会有变革	配合、合作，“用脚投票”

级是否能推动民主转型?中国中产阶级的改革动力是否真的很弱?不少研究认为,处于体制外的人更希望体制能有所变革,希望借此进入到体制内,获得原本缺乏的权力和声望;而处于体制内的人的改革动力则很弱,因为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希望维持体制的继续运行。与此结论相反,本文认为,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齐杏发 2010)几乎没考虑过进入体制,并对体制改革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在体制外的市场中是公平的,他们乐于待在这个付出努力就有回报的市场竞争的世界中,而排斥体制内世界。而体制内和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正因为与体制有长期接触,尤其了解体制的弊病所在,并且体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利益上的受损,所以他们希望体制能有所改革,以补偿他们的利益损失。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不同意如下结论:体制内和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改革动力很弱,因为他们是亲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体制外中产阶级有更强烈的变革诉求,但由于党和国家的控制而处于分裂的原子化状态,无法起而变革。

事实上,要成为体制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必须是社会上层的精英。而体制内或依附于体制的中产阶级都是由于体制而或多或少在利益上受损的群体。恰恰是这些人,虽然政治态度上有保守的倾向,虽然他们的抗争性很弱,但其内心的改革动力却是很强的,需要给他们创造更充分的政治表达和参与的渠道。

本文对政府未来的治理也有积极的提示意义。体制外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和弱政治行动,其前提归根结底是经济在不断发展。但如果经济形势下滑,出现大量的失业,那么体制外的市场化中产阶级可能就是最先“政治化”起来的一群人。面对恶化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财富多一点的人会选择用脚投票(和投行从业者一样),通过移民的方式离开原有环境,缺少财富、利益受损严重、甚至落到下层阶级的人会选择“造反”,起而为自己的权益抗争(桂勇等 2013)。因此,中国社会如今没有大的动乱的原因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可能是未来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本文初稿曾在2014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武汉)“社会分层与流动论坛”上宣读,感谢论坛主持人、评审人及与会者的评论和提问。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桂勇教授为本文提供的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学本科毕业生孙秋梦、衣然、冯博雅组成的医生群体心态调查小组,

为本文的部分章节提供了参考资料。笔者也感谢本刊匿名评阅人提供的批评性建议。

注释:

①有关私立医院医生和公立医院医生的比较是否比本文的三个群体比较更具可比性的问题,总体来看目前私立医院的医生所占比例非常小,并且私立医院在我国也不是主流的一部分,而以边缘性的专科医院(如妇科、男科医院)为主。因此,不能用一个边缘化的私营医院医生群体来代表市场化中产阶级群体这样一个重要的中产阶级子类型。

②鉴于篇幅,本文主要呈现的是访谈和微博文本引文,而不是数据分析。

③微博引文出处中“YRZHX”代表博主ID首字母,“20120519”代表博文发表日期,即2012年5月19日。下同。为保护博主隐私,在不妨害原意理解的情况下,引文都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

④访谈引文出处中“YS”代表受访者属于医生群体(“IT”代表IT行业从业者,“TZYH”代表投资银行从业者),“20130506”代表访谈日期,即2013年5月6日。下同。

⑤这是于2014年3月对工作于北京中关村的IT行业从业者的探索性邮件问卷调查,共回收58份有效问卷。在样本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受访者年龄在23~5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3岁,其工作年限在1~20年之间,平均工作年限为9年。

⑥他们排斥国家干预与国家垄断的行为,但是对行业内部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垄断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因为这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市场)择的结果。他们的信念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应该由市场而不是国家来挑选出它最好的“玩家”。

⑦参见黄金旺:《医患矛盾加深之患》(2013-01-06) [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_d275659423.htm](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_d275659423.htm)。

⑧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这涉及到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利益,它的既得利益,不可能拿出来的”(访谈,YS-20130426b)。

⑨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简介》(2014-05-20)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js/>。

参见《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第三节(2014-05-20)。

⑩参见佚名:《入行必读:互联网行业薪酬等级》(2014-08-06) <http://www.yixieshi.com/it/18329.html>。

⑪与体制的合作性是由市场化带来的后果。通过将这一维度纳入“利益获取形态”,从而完成了结构性位置(宏观)与主体性(微观)之间的连接。

⑫这种利益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是国家与社会的管理人员或者大型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利益。由于本文只探讨体制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就不纳入对上层阶级的讨论。

⑬作为拥有一定财产、享受制度红利的社会中上层阶级,由于他们认为这个社会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的保

护以及存在大量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他们因而害怕底层革命,害怕自己成为底层民众打击的对象:“底层人民最容易产生绝对的均贫富思想,最容易被打着均贫富的暴力革命所蛊惑,一旦爆发就是摧毁一切文明的力量。”(微博 LXDCRYYYY-20130505)

⑮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个群体中似乎只有投行从业者是对未来有“预测”的(而不是简单的“预期”)。精明的他们早已根据两种形势为自己做好两手准备。若社会前景看好,他们会留下来继续谋求更好的发展;若社会前景堪忧,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出国移民,将家庭和资产转移到国外,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的想法就是出走,也只能这样,能躲一段就躲一段,其实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吧,真的很辛苦,但是没有办法。”(访谈, TZYH-20130804)

⑯第四种利益类型是奉迎型利益,因为与本文关系不大,所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种利益的特点是,虽然群体与体制是弱关系,但群体试图改变这一他们所认为的“位置弱势”,尽力与体制保持密切的合作,主动往体制队伍上靠拢。由此带来的与体制有关的利益是奉迎型利益,与充满“委屈”的委身型利益正相反。房地产开发商和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即为这种利益的代表。

#### 参考文献:

- [1]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王宏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 边燕杰,罗根.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继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A].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3] 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J].学习与探索,2005(1).
- [4] 陈捷.中国中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及其政治行为[A].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C].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5]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6] 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2版[M].王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7] 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M].杜维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8] 桂勇,李经纬,唐鑫.如何认识中国中间群体与底层群体——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桂勇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3(5).
- [9] 郭巍蓉.态度是新医疗改革的晴雨表:一般医生与乡村医生的态度大有不同[A].黄荣贵,桂勇.当代中国医生心态研究[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 [10] 李路路.向市场过渡中的私营企业[J].社会学研究,1998(6).
- [11]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6).
- [12]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3]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6).
- [14] 刘欣.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一种权力衍生论的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5a(4).
- [15] 刘欣.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J].社会学研究,2005b(5).
- [16] 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J].社会学研究,2007(6).
- [17] 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 [18]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19]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杨小冬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20]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A].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21] 齐杏发.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2010(8).
- [22] 孙永芬.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心态研究——以广东调查为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23] 夏建中.社会分层、白领群体及其生活方式的理论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2008.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2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2.
- [25] 周晓红,陈青.全球化、社会转型以及中国中产阶级的构建[A].李成编.“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C].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26] 周雪光.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M].郝大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27] Szelenyi, Ivan and Bill Martin. “Three Waves of New Class Theories.” *Theory and Society*.1988, (17): 645-67.
- [28] Wright, Erik Olin.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 Society*.1980, 9(3): 323-70.
- [29] Wright, Erik Olin.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 Society*.1984, 13(4): 383-423.
- [30] Wright, Erik Olin. “Foundations of a Neo-Marxist Class Analysis.”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4-30.

(编辑: 部娜)

es that consider political factors in China's health policy research.

**Key words** : Political party's ideology; Health policy;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England

(7)

### **Paradox and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about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Governance of Large-Scale Projec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Grounded Analysis of People's Opposition to the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A in City B

*Tan Shuang Hu Xiangming*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 During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control and prevent social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launch large-scale projects, China is focusing 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However, the vicious cycle featur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manufacturing" universally exists in practice. Through a grounded analysis of people's opposition to the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A in City B, the paper extracts the concept of "paradox about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governance of large-scale projects"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 further construct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paradox about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governance of large-scale projects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generation of primitive social stability risks",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social stability risks and public response" and "the formation of paradox about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governance".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government sectors' improper behavior in the four links of risk management is the root cause that triggers the paradox. Therefore, stability assessment and stability management should be improv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of al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accurately targeted and "project orientation" needs to be switched to "people orientation"; secondly, system design should be improved and democracy be promo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assessment and governance; thirdly,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erception of public risks, a bridge needs to be built between "state discourse" and "social discourse".

**Key words** : Large-scale projects; Social stability risk; Paradox of risk governance; Generation mechanism

(8)

### **Positions in the "System" and Views on Social Change:**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Types of Middle-Class Professionals in China**

*Guo Weirong Wang Zhengfe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Social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are long debated issues among Chinese scholar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se issues are so debatable lie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 middle class itself. The differentiation is due to a variab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positions in the Chinese "System" ("TiZhi", mainly refers to the state-ownership syste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types of middle-class professionals is mad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ir different views on social change brought by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System". Doctors, investment bankers and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actitioners are selected to be analyzed.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extent of marketization and the "group identity - forms of obtaining interests" serve as two mechanisms that lead to the different views on what the main power of social reform (state or market) is and the different outlook (pessimistic or optimistic) on the fu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political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the three types of middle-class groups are thus also different.

**Key words**: State-ownership system ("TiZhi"); Middle class; Professional groups; Political attitude; Social change

(9)

### **Inhabitation Situation and Purchase Choic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2013

*Gao Bo Li Guozheng Chen Che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Abstract** : Migrant workers is a product of dual social structure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 special social group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China. Migrant workers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but they have always been the bottom group in the city, and can not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with local person. The inhabitation problem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easant-to-townsman process. By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analyses